

天圆地方的困惑

张 杰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天圆地方的困惑

——中国货币历史文化之总考察

张 杰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2 号

责任编辑：姜宏业
程建国

天圆地方的困惑

张 杰 著

*

中国金融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9.25印张 227千字

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49-0998-X/F·610 定价：9.20元

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

——《呂氏春秋·季春紀·圜道篇》

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內則有方，外則其圓。

——（東晉）魯褒《錢神論》

一部貨幣的歷史，濃縮了整個民族的歷史，它是社會發展史，更是文明演化史。

——佚名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文化的印迹	
——货币历史源头蠡测	9
1.1 楔子	9
1.2 奇特的图景	14
1.3 文化的较量	17
1.4 两个难题	21
1.5 不祥的预兆	26
第二章 理性的氛围	
——货币发展环境断想	30
2.1 理性的特质	30
2.2 “半两”的背后	34
2.3 儒家精神之迷雾	40
第三章 结晶的隳沉	
——货币发展轨迹剖析	46
3.1 对基本走势的估计	46
3.2 恋铜情结	52
3.3 怪胎的诞生	56
3.4 沉重的积淀	66
3.5 矛盾与悲剧	73

第四章 朦胧的闪烁

——货币认识历程纵观	79
4.1 对基调的估计	79
4.2 断裂与延续	85
4.3 “史家之绝唱”	97
4.4 超脱的禁锢	104
4.5 “恐惧——回恋”症	109
4.6 荣辱春秋	115
4.7 迥异的轨迹	124
4.8 古老弦律的余音	129

第五章 盛衰的踪影

——货币流通效应考察	135
5.1 耐人寻味的曲线	135
5.2 文化冲突的振颤	149
5.3 超经济力之驱使	154
5.4 错位与畸化	162
5.5 凝固与游离	167
5.6 警钟长鸣	172

第六章 凄壮的衰落

——货币经济深层咎因	181
6.1 一个基本认识	181
6.2 “温饱忧患”症	184
6.3 主宰的阙如	191
6.4 互化与变态	195
6.5 起衰的契机	204

第七章 扭曲与畸变

——金融格局总体把握	207
7.1 史踪探幽	207

7.2 失落的启蒙	217
7.3 自主意识之沉沦	222
7.4 最后的畸变	226
第八章 光环与投影	
——货币文化断面探微	235
8.1 金石文化	235
8.2 神权文化	243
8.3 矛盾文化	247
第九章 撞击与惊觉	
——货币历史命运思考	253
9.1 隐约可见的痕迹	253
9.2 内质的冲突	260
9.3 天圆地方的幻灭	267
9.4 “本位困扰症”	271
9.5 历史的必然启示	276
主要参考书目	280
后记	283

引 论

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I

货币，对于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现实中的人们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若用历史的绳索将它们串起来，所形成的“货币链”，则会放射出极不普通的光泽。这个“货币链”随着历史绳索的延长而不断延续。

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只关心货币的客观的真实价值，钱币学家则只关心货币的超现实的历史的价值，而货币史家则既关心前者，也关心后者。他们把这两者都排列在“货币链”上，构成一个互相关联的历史序列。货币史家的使命就是让货币的历史价值与其客观的真实价值对话。这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的：

历史和会死的个人不同，用克里特的阿尔克美昂的话说就是，个人不能把他的开端和结尾联接起来；但历史决不死亡，因为它永远把它的开端和它的结尾联接起来。①

① [意]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70页。版别见书末“主要参考书目”（凡《主要参考书目》中列具的书籍，皆同此）

货币史家便是作为“不能把他的开端和结尾联接起来”的“个人”却能把以他为终点的货币历史的“开端和它的结尾联接起来”的特殊使者。

只要用历史的绳索将货币的首尾“联接起来”便形成了货币史。尽管货币历史的客观本体只有一个，亦即历史的绳索只有一条，但联接方式的不同会形成千差万别的货币历史的主观认识，亦即会形成不同形式的“货币链”。但是，简单地排列和整理“货币链”绝非货币史的全部使命，可它却在中国似乎长期占据着货币史学的全部领域。人们似乎只停留在对“货币链”的简单排列和组合上，于是乎必然将过多的注意力投在浩瀚的典籍和考古报告上（这一点单独看来无可非议），为从中能得到使“货币链”加长一毫一厘的收获而欣喜并陶醉，由此形成的传统力量便无形中紧紧钳住了历史考察的翅膀。这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的現象，几乎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传统，中国货币史学的全部阵地就这样长期被本来作为其根基的钱币学所占领，它已经过久地徘徊在引证与考古之间的边缘地带。几乎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货币史学带有过多的钱币学气质。

考古和钱币学对货币史研究之重要性绝不意味着可以相互替代，越来越丰富的考古成就和钱币学基础只有使货币史学的大厦拔地而起才能真正显示其价值。若钱币学和考古成就不是以货币史学的构筑为导向，那只能算作一种简单的堆积和其拓片，或其文字说明的简单汇集。通过这样的方式构筑的货币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货币链”的简单连接体；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不能算作货币史学。因为，没有考察和探究、没有倾注人的情感的历史学不是真正的历史学。这样的历史学无非是一具冰冷无情的僵尸；而真正的历史学则是能够感到时代脉搏跳动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学，因为“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①中国的货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9页。

史学便更多地具有前者的面孔。中国货币史学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躯壳，而是血肉和灵魂；亦即中国货币史学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诸如丁福保的《古钱大辞典》、王献唐的《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之类的巨著鸿篇。自然，没有血肉灵魂的历史学、是一种没有性格的历史学，这种历史学最容易形成千人一面的系列，最容易导向盲目引证、亦步亦趋。这就是浏览一遍中国自古迄今还不算丰富的货币史成果，便有汗牛充栋感觉的原因。

“现实是历史造成的，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现实状况的说明，这种认识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现实活动，并通过现实进而影响未来”。^①历史学肩负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语）的重任。货币史家固然应随时通过取证和借助考古尽量克服“与生俱来的主观认识上的局限”，使自己的历史主观认识符合和真实表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的本来面目即本体的解剖中考究造成现实病症的根苗，以“古人”之“精微”，“启后人”之“津途”（章学诚语）。这就要求每一个史家笔下的历史伸出的是有血有肉的臂膀，让其脉搏时刻跳动于自己的把握之中。

Ⅱ.

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的问世而划了一个时代，它标志着中国货币史学开始告别附寄于钱币学的时代，向真正的货币史研究跨出了一大步。彭先生在初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值得关注的话：

前人所研究的多偏重货币的形制。钱币学家研究的对象是钱的形状、钱文的书体，把各代的钱名、像流水

^① 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6页。

帐一样抄录下来就算了事，有时连钱的重量和成色都不注意。至于钱的购买力，或为什么发行某种钱，发行后对于人民生活有什么影响，对于政治有什么影响，那是更加不问了。其实古钱的形制只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或灵魂是它的流通情形，尤其是它的购买力。它的遗体之值得我们研究，正如化石之值得生物学家研究一样，那是不可否认的。但如果我们能够从鸟类化石的研究而知道某种鸟在古代是怎么飞，发出怎样的叫声，其寿命如何，对于人类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岂不是更好吗？……以往研究货币史的人，多忽略了这一点，……①

彭先生治货币史的这一基本精神，同样应当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基本精神。但这种精神在之后的岁月里没有发扬光大，相反，钱币学气息却愈来愈浓烈地弥漫于货币史学领域；使彭先生的巨著不但不能成为一块基石，让后人构筑货币史学的大厦，反而成为一座似乎被后人叹为观止、不可逾越的高峰。后人除了补订些许彭先生因客观考古条件局限而无法确认或未能述及的钱币资料外，几乎无法从精神上有任何拓展。由于种种历史的局限，货币史学又复归到了彭先生之前的钱币学时代。看来传统的力量仍然沉重地压在货币史学的肩上。

英国著名历史学大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教授在其著作《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引比利时一位作家（P·勒布伦——笔者按）的话说：

历史学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它也许能够坚持住，并且能跨进科学的门坎，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能够成为“人类科学中的科学”。否则的话——如果它想回避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初版序言，第13—14页。

这场挑战——便要冒一场失去自己地位的风险，既不成为一门科学，也不成为一门艺术，只能成为一门“业余爱好”而苟延残喘下去。这样的历史学无疑还会受到尊重，而且非常流行，但被剥夺了真正的意义，失去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①

这简直是在评判中国货币史学的现状。中国的货币史学正在成为“一门业余爱好”，大量钱币爱好者、收藏者的出现与货币史学界对他们的偏爱所形成的畸形格局，不正好说明这一点吗？中国货币史学的“真正的意义”逐渐“被剥夺”，“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正在渐次“失去”。

可是，我们绝不能让货币史学沉沦于“消遣”，要让它告别已经徘徊过久的“十字路口”，成为某种使命的载体；必须主动把握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走出钱币学的氛围，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使命感唤回货币史学的灵魂。

I.

彭信威先生对货币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把货币史的经济内容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但他只是把货币史的经济内容与钱币学相提并论，并没有熔为一炉，这在《中国货币史》的体系和论证方式上表露得最清楚。他只是在将货币史作为经济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言，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没有经济内容的货币史（钱币学）和没有钱币学的货币史都不是完整的货币史；同样，将经济内容和钱币学拼凑起来而成的货币史也绝非真正的货币史。当然，人们有时将钱币学等同于货币文化史（彭先生似乎有此倾向）也是不妥当的，货币文化史具有更为广袤的外延和深邃的内涵。所以，钱

^①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69页。

币学充其量只能算作货币文化史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若不作这样的界分，则会妨碍从文化史的角度展开货币史研究的思路。

我对中国货币历史进行总考察的整个思路，就是在将货币既作为交换的结晶，同时也作为文化的结晶的前提下展开的。

作为交换的结晶，构成货币历史的共性，因为不论哪一个民族和地域，货币无不是被来自交换过程的浪头推出来的；作为文化的结晶，则构成货币历史的个性，不同的文化会孕育出不同的货币历史图景。后者往往是构成一个民族货币历史的主要因素，它总是将共性深深地掩藏在一个民族货币历史的最深处。所以，货币史家眼中和笔下的货币历史便更多地以“个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的货币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表现为一种文化的印迹。从珠玉龟贝到刀布环贝再到方孔圆钱的过程，是逐渐烙之以文化印迹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从生成、较量到定型折射到货币这一交换结晶物的过程。

方孔圆钱是中国货币文化的特有结晶。这个在理性的氛围熏陶下诞生的象征物，凝结了中国货币发展、终结的轨迹和命运。阴阳五行学说和儒家学说本来作为与货币刀布环贝时代并存的百家争鸣时代的不同学术派别，在方孔圆钱确立统治地位后，成为掩盖其神权内质的华丽外衣。从此，中国货币史进入悠长的天圆地方时代。

既然作为一种神权的象征，必然赋予其超经济的内质。为维护这一象征而与其同时配套形成的经济机制，注定其无力推动货币的本位进化，也注定了一切表面看来先进的货币形式，都因其内质的后滞性质而无法发育。其介入流通过程的效应也可想而知。当货币作为一种超经济力作用于经济的流通过程时，这一过程便无法适应和承受，最终必然爆发的法则之力使中国货币史呈现出一种无法走出的恶性循环状态。

可是，商人资本却从这种状态中异军突起。在封建社会似乎长期高举的“重农抑商”的烈烈旌旗下，历史却在“农”业的温饱忧患和“商”业的极度膨胀中蠕动。而工业作为未来经济的主宰却长期处于濒临寂灭的境地。一个庞大封建帝国的运转愈来愈建立在货币经济日益式微的基础之上。货币的经济推动力在商人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互化中消失殆尽，作为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信用（金融）从一开始就被这种互化所支配，成为商人资本和官僚资本畸型发展的更为精巧的依托物。

中国货币史的悲剧性结局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渐次酝酿着。西方货币文化跃跃欲试的姿态几千年来从未被正视。中国货币史就这样以“天圆地方”的确立而开始，以“天圆地方”的幻灭而告结。

中国人几千年来只有在这样的—个历史进程中观察货币。他们无法摆脱货币作为超经济的神权象征物的局限。先秦本来不太丰富的理论火花因绝少有人增添燃料，逐渐被政治家、理财家乃至文学家的说教气息侵蚀，又时而被一种与封建货币政策同根生成的诅咒浪潮吞没。留下的是与封建超经济货币政策带来的货币经济废墟相映衬的贫瘠的货币认识荒野。

但是，在这个废墟和荒野上，却出人意料地生长出一枝奇葩，历代货币超经济力的驱使不断给它以充足的营养，使其结出金石文化（钱币学）这颗硕果；经历代文人士大夫的青睐，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鼻祖。金石文化的玩好消遣气息也就无形中侵入货币史学的躯体。

IV.

历史是永存的，也是无限的，我时常告诫自己，作为一个有限的人的生命从来也不可能与历史相终始。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永远只有用自己有限的血肉之躯和与之俱存的思维力向人类

用有限的生命创造迭加而成的历史挑战。因此，不但无法摆脱历史留给我们的前人成论的好的或坏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踩在这些堆积的成论上去探究那遥远而深奥的历史真谛。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好象只有两条：一条是冒着以讹传讹的风险去迭代引证；另一条是相对超脱，“用文学和推论的气质”向漫漫的历史时空搜寻。所以，我尽管不想蹈近代以来历史哲学的过分玄想、思辩色彩过强的旧辙，但又没有把握保证不从中国传统的考证记叙、金石气息极浓的货币历史学走向这一极端。

我被这种两难的境况所困扰，同时也为无法解脱这种困扰而烦恼。

可是，历史从来就是充满困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困扰的历史学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不能算作真正的历史学。真正的历史学就是在困扰中诞生，同时也是在史学家从旧的困扰到新的困扰的永无止境的递进中发展的。

中国的货币史学缺少的就是困扰。困扰毋宁是它即将从恬静的消遣中解脱出来迈步前拓的先兆。

于是乎，我便不再为困扰而烦恼了。

V.

历史是一条清波与泥沙同时涌注的长河。历史的清波已经随江河而东去，但泥沙却无时不在沉积。因此，史学工作者的使命便不仅仅是扬其清波，更重要的是滤其泥沙，让过去的泥沙的沉积不再妨碍现在乃至未来历史长河清波的奔涌。我深信：

滤其泥沙，不扬清波而清波自扬。

第一章 文化的印迹

——货币历史源头蠡测

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情感，自己的死亡。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1.1 楔子

2000 多年来，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可敬的先民们留下的是一条虚幻飘缈的踪迹。我在他们留下的字里行间徘徊，唯一的顿悟就是无法从其中寻找中国货币起源的真谛。

在中国货币起源认识史上，《管子》作者是非常关键的人物。他们是这样描述货币源头的情形的：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

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①

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糴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糴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糴卖子者。^②

中国几千年的货币起源观无非是对《管子》如是学说迭代不绝的引用。后人每言货币之源，必奉《管子》为圭臬。尤其是在钱币学产生后，这个本来作为订正发展《管子》之说的最有力依据，反而将货币起源观从原来的歧途上越引越远。宋代罗泌写了一篇中国最早的货币起源史专论《路史·论币所起》，他之所以“博访古币，订以封禅之文，厘洗之刻，证以汉简”^③，是不满足于《管子》的禹汤之币，向更远的历史时空寻觅和确认什么是葛天之币、轩辕之币、黄帝少昊之货、尧泉舜金等。董道在《续钱谱》中也有相似考订。郑樵在《通志》中，要断言，太昊以来即有钱，且说：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以之与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相连接，这简直不是在探源，而是在讲传说故事。南宋洪遵在其集前人之大成的著作《泉志》中甚至有太昊葛天之币的式样，彭信威先生说是明朝人补画的，^④这更了不得，直到明代，还有人以太昊的葛天之币构图。可见，中国古人对货币源头的认识是多么迂腐无知，同时也说明，中国货币起源认识在古代，二千年间没有实质性进展。和《管子》相比，与其说是发展，毋宁说是倒退。因为《管子》所言禹汤“以金铸币”，禹时虽无把握，仅以汤时青铜之冶炼水平言，“以金铸币”在技术上是不成问题的。

① 《管子·国蓄》。

② 《管子·山权数》。

③ 罗泌：《路史·论币所起》。

④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33页。